



□ 陈长魁



在信息不发达的中国古代，中央政府会想尽办法加强与地方的联系。中央与地方本为一体，两者关系密切，地方是中央的行政基础，中央需要统筹全局。因双方视野不同，因此在照顾全国各地尤其偏远地方会有天然的困难。中国古代从上至下的行政系统是中央管理地方最重要的途径，除此之外，还有多种手段与方法。

监察

最初，中央巡视地方官员均是临时设置，没有形成完善的制度和体系，事毕即回，向君主复命。秦以后，在临时巡视的基础上，历代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监察制度，“监察”二字最能体现其本来的职责，监是监督，中央对地方官员的所作所为进行监督、督促，利用中央的权威震慑地方官员，防止及惩罚其贪污、不作为等行为。察是察访，中央需要及时了解地方的情况，如水旱、地震等自然灾害、地方发生疾疫等涉及地方民众生计的重大事件，地方没有足够力量处置，甚至隐瞒。

秦代每郡设监御史。汉武帝元封五年（前106年），分全国为十三部州，设刺史一人，部州为监察区，负责监察所在部州的郡国。这是一种在西汉正常行政体制——郡国并行制外另设的一种监察体制，主要监察各地强宗豪右和二千石官员，以中央规定的六条内容为监察事项。随着权力逐渐扩张，刺史逐渐向行政官转变。到王莽新朝改革时，州牧

正式成为地方行政长官，并沿用至东汉，行政、军事、司法等权力握于一人之手，导致东汉末年群雄割据，刘璋、刘焉以益州刺史而割据四川、重庆，刘表以荆州刺史占据长江中游广大地区，袁绍占领冀州、青州、并州、幽州，几乎统一了北方。隋唐时期，刺史或太守均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。

监察职能则由其他官员承担。唐太宗贞观元年，按照山川形便分天下为十道，长官称为按察使，主要监察州县官吏的工作。开元二十一年分为十五道，每道置采访处置使，检察非法，如汉刺史。又于边境置节度、经略使。采访处置使的职权甚重，除变革旧制须预先申报朝廷求得批准外，其余诸如罢免州刺史等事务，皆可自行处理，先行后奏，成为爆发安史之乱的原因之一，为平定安史之乱，唐代只能更加倚重节度使，使得藩镇割据成为困扰唐后期150年的严重问题。

宋代地方官的监察，由通判负责。同时，皇帝还经常派遣转运使、按察使、观察使到各地去监察，这些都属于外任御史。转运使本来是管理财政的，但也兼任监察官吏。南宋时，地方监司官职权加重，安抚使称帅臣，宰相外出巡省时，虽说是典宣，亦必兼此职。后来在安抚使之上设宣抚、制置二使，不领州而位在诸路帅臣之上，成为一路之长官。

明清监察制度最为完善，据《明史·职官志二》所载：“在内两京刷卷，巡视京营、监临乡、会试及武举，巡视光禄，巡视仓场，巡视内库、皇城、五城、轮值登闻鼓。在外巡按，清军，提督学校。巡盐，茶马、巡漕、巡关、饷运、印马、屯田。师行则监军纪功，各以其事专监察。而巡按则代天子巡狩，所按藩服大臣、府州县官诸考察，举劾尤专，大事奏裁，小事立断。按临所至，必先审录罪囚，吊刷案卷，有故出入者理解之。”职责范围遍布全国，总数110人，均为正七品官。品级低，但权限广，并直接向皇帝汇报，影响很大。

监察制度是中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，其制度设计有其合理性，历代均有设置并逐渐完善。

巡视

在正式监察制度外，历代统治者仍不断派出专使巡视地方。此类巡视均是因某事而临时差遣，是对监察制度的必要补充。

早在尧舜时期，每5年率百官巡狩四方，考察所属部落政绩功德，形成“五载一巡狩”制度（《尚书·尧典》）。夏朝至春秋，天子开始巡视四方，《礼记·王制》说：“天子五载一巡守，岁二月东巡守，至于岱宗；五月南巡守，至于南岳；八月西巡守，至于西岳；十月北巡守，至于北岳。”后世亦继承下来，秦始皇、汉武帝都曾巡行天下。

除天子巡狩外，派遣专使代替君主巡视则是更加可行的普遍现象。齐景公时，司马穰苴将兵扞燕晋之师，以“臣素卑贱，君擢之闾伍之中，加之大夫之上。士卒未附，百姓不信，人微权轻，愿得君之宠臣、国之所尊以监军”。于是齐景公让宠臣庄贾往，因迟到而被司马穰苴斩首示众。这是古代监军的开始，起源原因和后代迥异，乃因将领希望借助君主代表增加威信。汉武帝虽然建立刺史制度，但仍会临时性地派使者巡视地方，如宣帝元康四年（前62年）春正月，曾派中大夫强等12人循行天下，“察吏治得失”。历代类似专使数量众多，此不赘述。

“钦差”一词出现在官衔中出现于明代，如巡抚，官衔标准格式为“钦差巡抚某某等处地方都察院某某都御史某某人”，表明巡抚属于皇帝钦差代表。从明代巡抚产生亦可看出其钦差性质，洪武二十四年（1391年），朱元璋命懿文太子巡抚陕西，明显是临时差遣，事毕即回。宣德以后，巡抚成为各省常设。到清代，巡抚成为一省最高行政长官。而清代则出现专门的“钦差大臣”制度，

清代钦差使团包括钦差、钦差的随带属员，以及钦差和随员的家人，还有巡捕官。钦差由皇帝选派，随带司员多由钦差挑选，巡捕官由督抚选派，服务于钦差大臣、负责执行钦差大臣各项命令。

采风

民间舆论也是中央政府特别重视、了解地方实况的一个侧面。

采风是周代重要制度，亦称采诗。何休著《春秋公羊传解诂》记载周代有采诗制度，朝廷养了一些孤寡老人，称为“采诗官”，让他们摇着木制的铃铛到民间去采集诗歌。然后把采集来的诗歌汇集到朝廷的乐官那里，由乐官进行整理，朝廷也可以根据民间的诗歌来了解民情。《诗经》中《国风》部分就是从民间采集来的，从中可以看出约十五个诸侯国民间生活，“故王者不出户牖，尽知天下所苦”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记载：“古有采诗之官，王者所以观风俗、知得失、自考政也。”白居易有一首《采诗官》即是记此，“欲开壅蔽达人情，先向歌诗求讽刺”。

后世采风逐渐失其本义，变为采集诗歌等文学素材。汉代设立乐府专门负责从民间收集诗歌，已经变为专门的文化机构。

监察官员、专使巡视、民间采风，是中国古代中央了解地方，加强与地方联系的三种重要途径。派遣官员巡视地方是中国古代加强中央与地方联系的重要途径，不仅仅是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管理，更多是及时准确了解各地的动态，可以更加迅速解决地方存在的问题。自古以来即有中央官员巡视地方，由临时差遣逐渐形成制度，后世这种制度越来越完善。在监督制度外，历代仍会派遣各类官员巡视地方，了解民间疾苦，及时处置救灾、救荒等任务，此类官员由皇帝直接派出，到清代形成固定的钦差大臣制度。民间舆论亦是中央了解地方的一个侧面，童谣、歌谣等以诗歌的形式表达民间的生活及期望。

节俭持家的古人风范

□ 石志刚

我国古人崇尚节俭，为官者，也将节俭提升为治政的重要要素，作为治政的政治理念贯彻到政治实践中。

元代孔齐在《至正记》中说：“俭者，美德也。人能尚俭，则于修德之事有所补。不暴殄天物，不重裘，不兼味，不妄毁伤，不厚于自奉，皆修德之渐，为人所当遵。先人幼遭世变，衣食不给，至壮始有居。仕而得禄，家用日饶，盖亦勤于治生所致。自壮至老，三十余年，未尝妄用一物。资产虽中年颇丰富，亦未尝用过，犹如昔年也。”孔齐的成长经历和节俭精神值得后人学习。

宋代倪思在《经锄堂杂志》中指出：“俭者君子之德。”倪思针对当时世俗对节俭的排斥和抵触，鲜明地提出：“世俗以俭为鄙，非远识也。”节俭对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深刻广泛的影响。倪思对俭的价值理解得非常深刻和到位：“俭则足用，俭寡求，俭则可以成家，俭则可以立身，俭则可以传子孙。”节俭可以满足日常之用。周怡在《衡山寄示可贵儿》中强调：“一身吃着有限，吃些粗的，着些粗的，将就用些。”个体吃穿住行是有限的，能够满足日常之用就可以了。节俭可以寡欲少求。吴麟征在《家诫要言》中指出：“四方衣冠之祸，惨不可言，虽是一时气数，亦是世家习于奢淫不道，有以召之。”纨绔子弟之所以败家，在于他们没有坚持节俭的原则，而是选择追求奢华。节俭可以兴旺家业。朱柏庐在《劝言》中说，“勤与俭，治生之道也。”即使家庭富裕殷实，亦要节俭持家，家族必定会发展壮大、兴旺发达。节俭可以自立于世。王士晋在《宗规》中说：“多费多需，至于多取，不免奴颜婢膝，委屈佞人，自丧己志。”这是由于没有运用节俭精神指导个体行为而产生的后果。节俭可以给予子孙作榜样。宋代名臣司马光节俭持家，对孩子教育也贯穿节俭的精神。他在《训



俭示康》中以“吾本寒家，世以清白相承”而自傲，告诫孩子“以素俭为美”是人生最大价值之体现。

宋人郑至道在《琴堂谕俗编》中专门有“尚俭素”一节内容，书中认为：“俭，美德也，古人之所宝也。”郑至道引用古代例子来说明俭朴的重要性：“禹圣人也，帝舜称其德，曰克俭于家。人君富有天下，犹以俭为德，况民庶乎？”紧接着，郑至道具体围绕怎么做到节俭进行论述：“人能崇尚俭素，身自撙节，省口腹之欲，抑耳目之好。不作无益以害有益，不务虚饰以丧实费。食可饱而不必珍，衣可暖而不必华，居处可安而不必丽，吉凶宾客可备礼而不必侈。如此则一身之求易供，而一岁之计可给。既免称贷举息，俯仰求人，又且省事寡过，安乐无事。故富者能俭，则可以长保。贫者能俭，则可以无饥寒。岂不美哉？”宋代名臣王旦，虽然位居宰相高位，仍然能够以俭朴自持。他平常着布衣布衫，所居皆毡席。家人以缛绵装饰，他坚决予以抵制和否定。“虽位极品，而饮啖全少，家亦不蓄声伎。”他以身作则，家人亦有俭朴之风。“身歿之日，子弟犹有衣褐衣者”。王旦面对皇帝

的赏赐，能够做到拒绝，可见其节俭精神持有之坚定。宋真宗见王旦住所简陋，准备给他修缮，被他拒绝。宋真宗又试图赏白金五十两给他，他辞谢道：“已恨多藏，况无用处。”王旦教育其家后辈：“子孙当各念自立，何必田宅，徒使争财为不义耳。”临终前，王旦留下遗嘱：“我家盛名清德，当务俭素，保守门风，不得事于奢侈，勿得厚葬以金宝置棺中。”王旦去世50年后，宋朝的一位臣僚丁度仍以王旦俭朴之家风教育自家子弟：“王旦为宰相十五年，卒之日，子犹如布衣。汝曹自力，吾不复有请也。”王旦处在高位，仍能坚持节俭，“长保”效果最终显现。作为一个王朝的统治者，如果自身能做到节俭，可以为国家开源节流，发挥示范作用，夯实统治基础。

清代名臣朱轼治家节俭，治国从俭，将节俭精神很好地贯彻到家国治理中，取得了显著成效。他在家中，提倡节俭，而且还能做到以身作则。他“以身教俭，除供亿，减出入仪从，衣绵、啖粉”。在他的示范作用下，他的家人乃至仆人、下属“无敢曳纨绮”。他要求自己的夫人吃穿俭朴，每日与仆人一起洒扫、下厨。家中吃穿住行都有严格的规

定和标准，与常人无异，持之以恒地加以保持，多年下来，外人竟然看不出他是官宦之家。

朱轼不仅对家人严格要求从俭，而且在地方治政中，积极提倡和推广节俭精神。他在浙江担任巡抚的时候，看到浙江有追求奢华的不良风气，“浙俗竟为浮靡，民朝不计夕，弊甚”，制定了民间婚丧用度标准和定式，旨在矫正不良风俗，令官员百姓一律遵行。“久之，浙民便之，郡县长望风自仿”，民赞其行。除了颁布约束民俗的规定律文外，他还能细心周详地做好教化工作。在集市中，朱轼看到一个夫人穿着华丽，便问其夫是何人，回答竟然是卖菜者。朱轼感觉到民间追求奢华之风极大，于是告知她自己的巡抚身份，并亲自带着这位妇人回家，在厨房中，要求这位妇人认一下自己的夫人，妇人好长时间都不能确认。此时，朱轼指给她她说：“此炊者，夫人也。”这位妇人甚为惊讶。等到中午的时候，朱轼邀请这位妇人一起吃饭，这位妇人看到“饌惟蔬菜”，又为一惊。午饭后，朱轼便请这位妇人离署。这位妇人离开朱轼家后，深受感动、深感惭愧，于是改装从俭，且广为传播朱轼的节俭之事，“浙俗一变”。

朱轼作为康熙年间的大学士，不仅治家从俭，而且还能从朝政的高度，提倡节俭治国，将节俭的精神提升到国家兴衰的高度，殊为难得。他在治国中，十分强调用人、理财。他在临终前给皇帝的遗言中也申明：“国家万世根本，君心所重者，理财、用人而已。”从理财的角度看，他十分注重节俭精神的应用。正如陆游在《放翁家训》中所说：“天下之事，常成于困约，败于奢靡。”朱轼在推进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、积极发展农业生产、整顿国家财政过程中，十分注重开源节流，最终确保国库充足，国家富强。

历史散叶

喜欢历史的人都知道，要研究中国的古代史，首先要读的就是司马迁的《史记》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，被鲁迅先生誉为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”。很多人读过《史记》，但真正通读细读深读的人并不多，不是不愿读，主要是不知怎么去读，往往读了几篇就坚持不下去了。究其原因，一是文言文晦涩难懂，很多历史典故和古文表述成了拦路虎。二是年代跨度大，人物关系错综复杂，剪不断，理还乱，看不懂，记不住，讲不清。其实读史书本身就是一个费劲的活儿，没有一定的耐心和毅力是不行的，但也不是没有捷径，笔者这些年读《史记》有一些零星的体会。

围绕人物读。《史记》之所以称为纪传体通史，就是围绕人物展开的，一百三十篇中除了十表、八书外，十二本纪、三十世家、七十列传都是写人物的。要读《史记》，首先要了解作者司马迁这个人物，《史记》中虽然没有司马迁传，但有两篇等同于司马迁的传记，一篇是《太史公自序》，一篇是《报任安书》，后来班固的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也基本是来自司马迁的这两篇史料。通过司马迁的这两篇“自传”，我们知道司马迁是在受了官刑之后开始写《史记》的，而受官刑的原因是“李陵之祸”，就是替李陵辩护惹的祸，这就引出了李陵这个人物。李陵是名门之后，飞将军李广的孙子，大将军李敢的儿子。李陵年轻有为，英雄善战，司马迁给了其“国士之风”的赞誉，因为与匈奴打仗失败，又被汉朝误解投降匈奴，做了匈奴单于的女婿，最后老死在匈奴。李敢得知卫青与其父李广之死有关系，便打伤了卫青，卫青是何等人物，他是汉武帝第二任皇后卫子夫的弟弟，于是卫青的外甥霍去病就在甘泉宫狩猎时用暗箭射杀了李敢。这些在《李将军列传》《匈奴列传》《卫将军骠骑列传》中都有充分记载，由李陵这个人物，就可牵出汉景帝、汉武帝、汉昭帝、李广、李敢、卫青、霍去病、程不识、公孙贺、李息、公孙敖、张次公、苏建、赵信、张骞、卫子夫、霸陵尉、匈奴单于等众多人物。这么多人物，记住就非常困难，想搞清他们之间的关系更难，这些人物就像一个单独的瓜，而李陵这个人物就像一条藤，顺着这根藤，弄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容易多了。

带着疑问读。比如读《报任安书》，这是司马迁写给其友人任安的一封信，这封信，对于了解司马迁的生平和思想十分重要。读懂这封信，要弄明白这么几个问题，其一司马迁和任安的关系，从史料上看两人是好友，但两人是怎样结为好友的，这个问题在史记《田叔列传》《卫将军骠骑列传》中可以找到答案。其二任安是一个怎样的人？要了解任安，单读《报任安书》是不够的，要读《田叔列传》，这里面对任安有较为详细的记载。其三司马迁这封信是写给任安的吗？从史料上看，任安曾写信给司马迁，但司马迁并没有及时回信。司马迁写《报任安书》时，任安已经被投入监狱，任安不可能看到这封信，所以可以断定，司马迁写这封信不是真正写给任安的，是写给自己的，是写给历史的，是借任安之名，阐明自己创作《史记》的壮举，抒发自己的人生抱负和理想。

结合其他史书读。司马迁《史记》中的很多史料，取材于《左氏春秋》《论语》《国语》《世本》《战国策》《秦记》《楚汉春秋》等典籍，司马迁之后，又有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《三国志》《资治通鉴》等史书记载。由于历史的原因，对同一个事件，同一个人物，记载会有不同，要全面准确地了解这段历史或这个人物，一定要多读几个版本，综合起来分析判断。比如关于项羽这个人物的刻画，在司马迁、班固、司马光笔下各有差异，司马迁在

怎样读好《史记》

□ 清 风

《史记》中把项羽列入本纪，以帝王的地位描写项羽，饱含了对项羽的爱慕和尊重；班固在《汉书》中认为“成者为王，败者为寇”，将项羽与农民起义首领陈胜一起编入列传，体现了班固的儒家正统思想；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对项羽之死，就描述了一些《史记》《汉书》中不曾有的细节。比如关于伯夷、叔齐的评价，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把他们作为人物列传的首篇，可见对伯夷、叔齐这两个人物的重视。其实在司马迁之前，孔子、孟子、墨子、韩非子、庄子对这两个人物都有评价，司马迁之后，屈原、陶渊明、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韩愈、范仲淹、司马光、文天祥、顾炎武等名人也都有诗词吟诵。所以读《伯夷叔齐列传》时，不妨把这些大家、名家的评价找来一起读一读，相信理解会更深一步。又比如，我在读《秦始皇本纪》时看到赵高“指鹿为马”的记载，感到不太可信，是不是虚构的事儿，就查找了其他典籍比对。《后汉书·窦宪传》记载：“深思前过，夺土田园时，何用意愈高指鹿为马？久念使人惊怖。”《旧唐书·仆固怀恩传》记载：“陛下必信矫词，何殊指鹿为马？”《三国志·魏志·鲍勋传》记载：“大军还洛阳，曜有罪，勋奏独遣。而曜密表勋私解驂事。诏曰：‘勋指鹿作马，收付廷尉。’”宋苏轼《上神宗皇帝书》记载：“内重之弊，必有奸臣指鹿之患。”这些历朝历代的文献中都没有怀疑态度，基本印证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。

动笔读。俗话说“不动笔墨不读书”，我有切身感受。以前史书也读了不少，但多是泛泛而读，翻翻而已，过后没有什么印象。我这次读《史记》，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，除了批注圈点之外，就是坚持写读书笔记，就关心的问题、困惑的问题、质疑的问题、批判的问题，详细读、深度读、比较读、研究读，并写出来。粗粗算来，繁忙的工作之余，也写了近百篇札记，每篇都不长，1800字左右。如《周公解梦不是周公写的》《孔子真的看不起管仲吗》《秦始皇“坑儒”质疑》《晁错“错”在何处》《假如毛遂不自荐》《出身不同的两个韩信》《司马迁的经济思想》《史记典故歌》等等。每写一篇文章，就要反复读几遍原著，还要找其他资料佐证，这样读肯定是忘不掉的。尤其是写《史记典故歌》，我把出自《史记》中的142个成语典故串在一起，组合成诗歌，这数百个成语就是数百个故事，以此来加深司马迁原著的理解。

